

011
G C Z Y Z T M S Y J

共產主義者 同盟史研究

徐耀新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共产主义者同盟史研究

徐耀新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长期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史的学术成果。作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同盟的创始人、同盟的性质和地位、纲领和章程、民主革命策略的形成和制订、以及若干史实的真伪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独立见解。书后还附有同盟史大事纪、同盟史中外文书目。全书立论新颖，史料翔实，论证严谨，是一部具有较高政治和学术水平的专著。

责任编辑 王其平

共产主义者同盟史研究

徐耀新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校内）

练湖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6.75印张 151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305-00691-2

K·61

定价：3.50元

序

1847年6月2日—9日，德国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治组织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把正义者同盟改组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时至今日，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尽管共产主义者同盟人数很少，在极盛时期也只有几百名盟员，尽管它存在的时间只有5年多，在1852年11月就解散了，但它始终没有被人遗忘。无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不断回顾它，对它作出种种不同的，往往是截然对立的评论，并彼此因它而进行经久不衰的争论。

这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种殊荣。它之所以获得这种殊荣，是由于它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这种历史地位不断赋予它的重大现实意义。

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任何一种社会理论所不能获得的强大的实践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确认，它成了革命地变革世界的理论和争取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鼓舞源泉，它使世界发生巨大的革命变化，对现代人类的整个科学和文化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显示出自己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全世界的人们，不管愿意与否，不管从什么样的立场出发，都得重视马克思主义和以之为理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

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

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了它的创建和领导，并成为它的灵魂。它是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它的纲领就是它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它制定的《共产党宣言》。它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制定的章程至今仍被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视为圭臬。它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洪流的源头，它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断回顾和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力图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则，深刻了解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真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学者则力图通过贬低和否定共产主义者同盟来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

当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峻的挑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威力，探索新的战略策略，开拓新的道路以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任务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在这种形势下，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史的现实意义，无疑比以往更大了。

但是，我作为一位共产主义者同盟史的研究工作者，在看到国外一大批史学家在研究同盟史，甚至同盟的前史，并不断大量出版专著和史料的时候，常常不无感慨地看到，在我国，同盟史的研究工作还很薄弱，有志于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这一领域的学术专著凤毛麟角，并且颇难寻觅到出版者。

因此，当我得知本书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感到格外的高兴，对作者和出版者充满由衷的感谢和敬

佩，并欣然允诺为本书写几句话。

本书作者徐耀新副教授是我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年轻有为的学者。他 80 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当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潜心研究同盟史，并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文章，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收入本书的论文，反映出他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他注意扎实地掌握和分析史料，广泛地了解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情况，并批判地吸收他们的见解，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论断，使本书史料翔实、论证严谨、立论新颖，成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

此外，我觉得还应该特别指出两点。

首先，作者采用了全方位的研究方法。在同盟史的研究中，长期盛行 50 年代苏联史学家的方法：仅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个方位去研究。这种单方位的研究方法往往引导史学家们得出片面的结论。他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成似乎是同盟仅有的两位创建者；把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双方的双向融合过程，描绘成似乎只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积极的改造者一方，对以革命无产者为消极的被改造者一方，实行单向改造的过程；从而把一部同盟史写成一部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史。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指出的事实：同盟是两个独立的派别，即纯粹的工人运动与马克思的名字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运动互相融合的产物，这个融合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其中所有的人，不论是工人还是哲学家，都同样地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恰恰事与愿违地无法科学地揭示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容易造成一种错误印象，似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自己的理论强加给工人运动。而作者在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和领导同盟方面，在制定同盟的纲领和策略

方面所起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全方位地研究了其他革命家在各个方面的巨大贡献，正确地反映了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历史必然性。我相信，如果我们进一步运用这种全方位的研究方法，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一定会有极大的改观，同盟丰富多彩的历史面貌将会呈现在我们面前。

其次，作者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批判性探索精神。他不满足于现有的各种结论，而只承认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对同盟史研究中的许多新旧问题，如同盟的性质和地位、纲领和章程、理论和策略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他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坚信马克思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革命的和发展的理论，从而根据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和发展了的革命实践，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原理和策略原则，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个别论点和实践，去澄清后人强加给他们的“左”的或右的错误解释。应该指出，某些见解也许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但作者实事求是的探索态度是可贵的。某些见解也许会引起争论，但争论只会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任何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如果没有争论，必然死水一潭，不会有什么发展。

胡文建

1990年6月

于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目 录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问题新探·····	(1)
二、共产主义者同盟性质和地位商榷·····	(16)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研究·····	(31)
四、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三个稿本研究·····	(58)
五、共产主义者同盟民主革命策略的形成和制订·····	(71)
六、共产主义者同盟史若干问题新考·····	(118)
附件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史大事纪(1836—1852)·····	(129)
附件二、共产主义者同盟史中外文书目·····	(184)
后记·····	(207)

目 录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问题新探·····	(1)
二、共产主义者同盟性质和地位商榷·····	(16)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研究·····	(31)
四、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三个稿本研究·····	(58)
五、共产主义者同盟民主革命策略的形成和制订·····	(71)
六、共产主义者同盟史若干问题新考·····	(118)
附件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史大事纪(1836—1852)·····	(129)
附件二、共产主义者同盟史中外文书目·····	(184)
后记·····	(207)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问题新探^①

内容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始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在本文还论述了沙佩尔、莫尔、鲍威尔、沃尔弗也理所当然地算作同盟的主要创始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和共产主义理论运动的代表两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本文主要论述了实际工人运动的领袖沙佩尔、莫尔、鲍威尔为创建同盟所作的贡献，指出没有这“三个真正的人”，也没有第一个共产党；论述了沃尔弗为建党所作的贡献。

（一）同盟是德国社会主义两派的融合

在有关国际共运史的教科书和同盟史的专著中，被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的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苏联学者康捷尔写的同盟创立史专著的书名就叫《马克思、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称该书的任务“就是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雏形——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制定党的纲领和策略原理的初步活动情况”^②。把一部同盟的创立史写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① 本文曾刊登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季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一期。

② 康捷尔著：《马克思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三联书店，第2页。

建党活动史，这并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是实际的工人运动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运动相结合的最初产物。这一过程不是一方积极改造和另一方消极被改造的历史，而是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历史。恩格斯说：“德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的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运动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这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个革命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是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同样地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冒了生命的危险。”^①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纯粹工人运动”，就是指1836—1838年在巴黎形成的德国工人的第一个独立政治组织“正义者同盟”。这派的领袖和代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转变和新的世界观的创立也起过促进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身上学习和吸取了不少东西。恩格斯之所以到伦敦后，马克思之所以到巴黎后才成为共产主义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同工人运动及其团体有了联系，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品质和力量所在。1885年恩格斯还深情地回忆他在1843年同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沙佩尔、莫尔、鲍威尔的会见写道：“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对于他们的狭隘的平均共产主义，我当时还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与之对立，——但我永远也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页。

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人在我自己还刚刚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所留给我的良好印象。”^①可见，德国早期社会主义两派的领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两派的融合就是相互取长补短。

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史的起点看，它远远早于马克思、恩格斯建党活动史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毫无宗派偏见，具有宽广的科学胸怀。正义者同盟最初同他们毫无关系，但是，它产生和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他们始终把正义者同盟的创立当作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史的起点。1860年，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者同盟**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②这决不是笔误，而是马克思的有意强调。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七个字不仅是用黑体字铅印的，而且马克思紧接着说：“最初用的是另一个名称”，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总的名称下，描述了它从1836年到1850年解散的历史变迁。^③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也是从1836年正义者同盟的建立叙述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从广义上说，正义者同盟也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恩格斯在1843年时就称它为“共产党”。^④它为寻找正确的理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到40年代中期后逐步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历史过程是不能割断的。马克思、恩格斯建党活动是在40年代中期，比同盟的创立史起点要晚近十年的时间，从时间上说也是不能划等号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活动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846年初至1847年初，这是他们建立和发展布鲁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8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87页。

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时期；第二阶段，从 1847 年初至 1848 年初，这是他们加入正义者同盟、帮助它改组时期。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马克思、恩格斯企图依靠一个人数很少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集团建党。他们创建的通讯委员会，不是一般的学术团体，而是他们建党的第一次尝试。这个组织在德国国内，除了靠了同家乡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威廉·沃尔弗在西里西亚工人中成立一个通讯委员会外，其它地方都没有成立起组织。在德国以外，靠了伦敦正义者同盟建立了一个通讯委员会；恩格斯 8 月亲自去巴黎后，争取了一部分正义者同盟盟员，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小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正义者同盟的影响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正义者同盟自身的探索也使其进步，到 1846 年底，伦敦同盟领导人和盟员普遍相信马克思、恩格斯新观点的正确性。1847 年初，他们派出特使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入盟并帮助改组同盟。马克思、恩格斯紧紧握住了工人政党领袖主动伸出来的手。以此为转折点，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活动进入了成果辉煌的第二阶段。在正义者同盟内，他们才真正找到了用武之地，最终实现了建党的夙愿，成了第一个共产党的创始人。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活动必须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同工人运动的领袖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真正实现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如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魏德迈、丹尼尔等）和革命的无产者（如沙佩尔、莫尔、鲍威尔、列斯纳、埃卡留斯、哈尼等）在统一的组织中合作，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发展规律。

（二）“三个真正的人”是同盟当之无愧的创始人

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社会主义理论运动的杰出代表。沙佩尔、莫尔、鲍威尔则是德国纯粹工人运动的卓越领袖，这“三个真正的人”坚持十多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工作，为正义者同盟的创立、发展和最终改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当之无愧的主要创始人。

正义者同盟是从国外成立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组织中分化出来的。学术界有人只提它是从巴黎的“流亡者同盟”分裂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其实，在流亡者同盟稍前即1834年4月15日在瑞士成立的德国人的“青年德意志”秘密同盟也是正义者同盟的直接前驱。它内部也存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的分化和斗争，沙佩尔、莫尔、鲍威尔都是这个组织中无产阶级派的骨干。正当巴黎的流亡者同盟内部即将发生分裂时，“青年德意志”遭到了瑞士政府的镇压。1836年春天后，它的一大批成员被迫移居巴黎，沙佩尔和莫尔也在其中，鲍威尔在下半年也来到巴黎。有的著作说，沙佩尔到巴黎后立即加入了流亡者同盟^①，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并不可靠。沙佩尔7—8月来到巴黎时，流亡者同盟已经或正在发生分裂，无产阶级派一部分一部分地从里面分离出来，而他作为“青年德意志”无产阶级派骨干并没有加入“流亡者同盟”，在巴黎努力建立“青年德意志”的俱乐部，与流亡者同盟竞争，成员很快达到了268人，最后同流亡者同盟中分裂出来的无产阶级派合流，共同组成了正

^① 康捷尔编：《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三联书店，第75页；张友伦：《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义者同盟。^①可见，沙佩尔为首的“青年德意志”是创建正义者同盟的一支重要力量，沙佩尔也是同盟的主要创始人。最初他的贡献甚至比魏特林还大。魏特林在1836年春去了维也纳，1837年9月在重返巴黎后才加入正义者同盟，在同盟初创时期并不是直接参与者。沙佩尔不仅自始至终直接参加了同盟的创建工作，而且也是同盟纲领的起草人之一。1838年，正义者同盟进行了制订纲领的广泛讨论，沙佩尔是讨论的主要组织者，并集中了大家的意见，试图起草纲领，写下了《财产公有》这一文件。后来成为纲领正式起草人的魏特林曾说到他当时受托起草纲领时另外还有一个“竞争者”，这个人就是沙佩尔。

沙佩尔等人领导的伦敦同盟在思想上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法国和瑞士，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已在工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并正在进行不同于密谋活动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来到这里的同盟盟员，不禁耳目一新，影响渐深，逐渐脱掉了手工业者的狭隘性质。他们思想上的第一个进步就是摆脱了原先的巴贝夫主义的密谋策略，转而学习英国工人阶级，重视理论学习和革命宣传，开展政治斗争。到1844年下半年后，正当瑞士的同盟急剧衰落、巴黎的同盟仍停滞不前时，伦敦的同盟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它的组织力量大大发展了，工人教育协会成立时才7人，到1844年才30人，到1845年发展到了250人（到1847年已超过千人）。^②组织性质也有了国际性，参加协会的除了德国人外，还有欧洲一些民族的代表；

① 阿尔明·马特乌斯·库尼克《卡尔·沙佩尔》，1980年德文版，第57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5辑，人民出版社，第192页。

它的章程和会员证上也开始用多种文字写上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同盟的领导人还积极加强同其它国家民主派和工人团体的联系，1845年9月22日终于同宪章派一起在伦敦成立了国际“民主派兄弟协会”。1846年秋，同盟中央也从巴黎迁到伦敦，由沙佩尔、莫尔、鲍威尔组成新的中央。恩格斯高度肯定他们在这—段时期为发展同盟所作的工作，认为“基础已经打下了”^①。

自同盟的中心移到伦敦后，沙佩尔等人率领盟员们进一步向科学共产主义靠拢，同过去支配同盟的魏特林主义实行了决裂。1844年8月魏特林在瑞士服刑期满后到达伦敦，伦敦同盟领导人最初把他作为“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勇敢的天才和领袖”。但是，政治思想上正在走下坡路的魏特林，经过瑞士政府的迫害，又产生了迫害狂和夸大狂，宗派主义更加膨胀。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沙佩尔等人的认识水平远远高于魏特林，并亲身体会到魏特林主义的荒谬性，同他的关系逐渐恶化了。1845年2月至1846年1月，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举行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讨论会”。魏特林同他气味相投的克利盖结成一派，发表了不少错误观点，鼓吹共产主义随时都可以建立，宣扬未来的德国革命可以直接导入共产主义，主张密谋蛮干。沙佩尔、莫尔、鲍威尔、普芬德等人坚决反对这种论调，认为共产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这一代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反对感情用事，强调当务之急是宣传和启蒙。其中还有人阐述了宣传和革命的辩证关系，认为：“不应对单纯和平的启蒙抱多大指望。如果没有巨大的实际事件强迫占有者，他们是绝不会让步的。……不斗争就什么也得不到；启蒙不断为新的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0页。

命作准备；它不可能避免革命。”^① 针对魏特林主张的流亡无产者、激动的青年、感情用事的妇女、功名欲者和征服者、甚至君主也“会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观点^②，他们坚决驳斥说：“不！是工人将这样做；如果……他们得到启蒙，就会立即提出自己的要求。”^③ 他们批评欧文、卡贝的思想体系和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是“兵营式的”^④，认为“共产主义的实质必然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⑤。这些观点几乎接近了《共产党宣言》的水平。这一系列原则分歧也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中同魏特林和克利盖斗争的主要内容。虽然沙佩尔等人不可能完成从理论上彻底清算魏特林、克利盖的任务，但他们毕竟揭开了这一斗争的序幕，并早于马克思、恩格斯独立地实现了同魏特林的决裂，促进了同盟的思想进步。后来在马克思、恩格斯进行这一斗争时，沙佩尔等人给马克思写信说：“至于说你们同魏特林的决裂，这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事，现在果然发生了……以前在我们这里发生的情况，同现在你们那里发生的一模一样。”^⑥ 显然，不能把正义者同盟对魏特林的抛弃仅仅归功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

在同盟中心转到伦敦后沙佩尔等人的又一个贡献是：他们支持并配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魏特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并在伦敦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一些著述中流行着一种说法：这一斗争曾遇到了来自伦敦同盟领导人的阻碍和反对，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如前所述，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第223页。

②③④⑤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第229、230、233、233页。

⑥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辑，第118页。